**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我看流民阶层与东晋社会

赵荣旭

**摘 要** 严格来说，把流民列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不准确的，按照传统的“四民”等级划分，流民是农民阶级在一种特殊历史状态下衍生出来的特殊群体，并不会长期独立的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会随多方面因素的改变而此消彼长，因而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群体。西晋几经变乱后，出现了大量流民，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阶层迅速膨胀，使司马氏政权不得不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此后，随着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南方的经济及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为司马氏政权的重建奠定了基础。流民形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如京口集团及北府兵等，有效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也成为平衡朝堂之上各门阀士族的一颗棋子。东晋政权与流民势力密不可分，为了突出流民势力的重要性，故笔者将流民在两晋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另划为一阶层，本文即是笔者对于流民在政权塑造、社会生活方面作用的看法及理解。

**关键词** 流民；两晋；社会发展

流民阶层作为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组织，在西晋末期乃至东晋一朝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流民集团大量盘踞在江北地区，对外有效抵御了刘渊、石勒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铁蹄的践踏，使东晋能够安守一隅；对内则起到平衡门阀与皇权、门阀与门阀的作用，使东晋的政治格局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此外，流民阶层的南下有效的促进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及民族融合，这将于下文详细的探讨。另一方面，在东晋中后期，流民集团逐渐摆脱侨姓士族的控制，更多地以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最终北府兵将领刘裕异军突起，成为东晋一朝的掘墓人。

1. **西晋末期南迁流民的原因与分化**

西晋末年，尤其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其社会环境早已不适合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们生活居住：其一，西晋末年战乱频发，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摩擦不断，“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1]](#footnote-1)。战争范围的不断扩大及发生频率的不断上升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导致世家大族及流民被迫迁徙他乡以谋生路。其二，受中国传统思想“华夷之辨”影响，自奉正统的中原地区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对居于“蛮荒之地”少数民族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歧视及排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2]](#footnote-2)正是这种尚同排异心理的写照。加之游牧民族统治的暴虐与对占领地区的人民大肆仇杀，使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带有一种恐惧及仇视心理，因而汉族人民自动放弃家园纷纷逃离，促成了北民的集体南迁。

为了谋求更加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北方地区的“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3]](#footnote-3)，都城洛阳被攻陷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4]](#footnote-4)。这些人从中原地区四处奔散，纷纷向较安定的周边地区迁徙，从而形成了规模很大的流民潮，其中又尤以南渡者为多。这些南渡的流民多以集体的形式共同行动，按人身自由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随侨姓氏族南下的部曲、宾客等人身依附力极强的贫民组织；另一类则是以宗族为单位或同处相同地域的自耕农在地方有一定影响力人的领导下联合形成的自耕农组织，这两类南迁组织在此并称为“流民集团”。贫民组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东汉庄园经济广泛存在，使得大量自耕农转化为宾客、徒附等，打破了原有小农经济相对分散封闭的特点，使小农这样一个社会地位较低、脆弱且相对保守的阶层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政治地位独立、内部结构分工体系较为完善并且基本可以实现生产自给自足的封闭组织。贫民组织与地主之间有着极强的依附性，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买子”[[5]](#footnote-5)，这也为两晋之际的贫民组织跟随侨姓世族集体性南迁打下了伏笔。到西晋时期，司马政权实行占田制及荫客制，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给予一定的特权，在国家制度层面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使贫民集团和豪门士族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两晋之际，大量在朝为官的高门士族及散居于地方的次等士族纷纷南下，依附于它们的贫民组织亦不得不随之南渡，构成了南下流民集团的重要一部分。

相比之下，自耕农组织的结合更具一定的偶然性，他们在宗族家长或地方官的带领下，往往是县、乡、里整体的迁移，在杜弢给应詹的遗书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早年经历：梁、益两州的流民“天步维艰，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6]](#footnote-6)。从这里可以看出，北方的自耕农流民大都是以地域为单位有组织的向南集体迁徙。与杜弢同时期的苏峻，其父为安乐相，苏俊本人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在永嘉之乱后,“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而且“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在曹嶷为青州刺史时将要讨伐苏峻，苏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7]](#footnote-7)，由此可以看出，苏峻作为本地较有名望的士族，在本地积聚起一定的影响力，战乱一起便能凭借其号召力统率本地居民形成相对独立的基层组织用以自保，并在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能力率领其部下集体南迁。苏峻如此，其他北方地主士族亦可能如此，从侧面体现了地方势力对于流民集团南迁所起到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二.流民大量涌现与两晋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

西晋末年，腐朽的司马氏政权经过了永嘉之乱、八王之乱的冲击，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西晋王朝才历四帝便衰落下去，不久即宣告灭亡。战乱造成的农民与土地分离形成了大量流民，流民数量的迅速增加及流民问题愈演愈烈加剧了司马氏政权的衰败，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耕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君王大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魏晋承袭汉朝，以农为本显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农业税是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支撑着西晋皇室庞大且奢靡的巨额支出，给予国家机器运转的物质方面的保证；另一方面，农民还是国家徭役的承担者，承担着国家的工程建设及军事防卫任务。因此，国家劳力的多寡与国家整体实力有着密切联系。西晋末年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到处是“城邑皆空，野无烟火”[[8]](#footnote-8)的破败景象，土地荒芜，国家的财政税收大幅削减，劳动力以及国防兵员日趋枯竭，对于司马氏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仅对于西晋经济方面的冲击，就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课田之实，较之九州，数过万计”[[9]](#footnote-9)的残败局面。无可否认，流民潮集团产生及迁移对于西晋政权的瓦解，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大规模的流民潮出现后，西晋政权并没有出台合理的措施安抚流民，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对流民进行限制与打击，下令让各地州郡长官强迫流民返回原籍。政府与流民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引起了流民的反抗，如遇战乱带领同乡之人迁移到宛地的王如，朝廷下诏强令其返回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诸无赖少年，夜袭二军，破之”,“未几，众至四五万，自号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10]](#footnote-10)，王如最终虽归附王墩而被诛杀，却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的统治根基，是使其走向灭亡的重要推手。

此外，流民也与迁入地的土著居民有着激烈的冲突。一方面，由于迁入流民缺乏土地或其他收入来源，“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11]](#footnote-11)，破坏了社会秩序，给当地治安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然而，更深层次的，则体现在流民与当地居民的一种文化差异，具体则包括民情、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等。本地居民对于进入当地的外来势力表现出一种不信任与防备，怕有损于其既得利益，因而大力抵制。“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12]](#footnote-12)，流民的到来，分占了当地的为数不多的资源如土地、水源等，因而与当地居民长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造成了社会不稳，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对西晋政权还是对迁入地土著居民，流民都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由于缺少政治代言及经济实力，流民阶层在层层重压下显得孤立无援。为了争存更好的生存环境，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当流民与两者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时，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反抗，诱发了一系列的流民起义。可以看到，流民起义给西晋政权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由于政府对于流民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粗暴蛮横的措施，非但无益于流民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这一社会问题且愈演愈烈。流民集团的大规模起义加剧了地方分裂，很大程度上牵扯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兵力，削弱了西晋王朝的整体实力，使之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我无法说流民因素决定了西晋的灭亡，但无法否认的是，流民问题的加剧确实是西晋灭亡的一大推手，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衰败。

与此同时，许多流民结成流民集团向四处迁移以避战乱，其中尤以南渡者为多。据不完全统计，南下的流民约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同时又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13]](#footnote-13)，尤可见南渡流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流民集团的南迁一般具有核心人物或核心家族，依据他们的身份、财产以及地位上的差异可分为两个不同的等级。一为掌握中央权力的高门士族，其组成人员多为西晋皇族及朝中高位公卿，他们握有大量土地，即为前文所说贫民组织的核心。他们在变乱中为求自保，带领其辖有的部曲、宗客纷纷南下，形成一个个人数众多的贫民组织（事实上所说的贫民组织并不包括这些贵胄,只是描述主要组成力量）积聚在门阀士族旁，成为侨姓士族在南方开展生产及对抗中央的依靠力量。二为地方次等士族、地主及一些地方官员，他们即上文所提自耕农组织的主要核心，他们本身并无太多特权，依靠的仅为土地、财产及一定的威望，因而自耕农与之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很强。

永嘉元年七月，身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同党王衍为了给自己谋求一条退路，派宗室旁支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东南诸军事、假节的身份出守建邺。湘州爆发流民起义后，司马睿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成为南方官方的管理者。但在司马睿初到南方时，遭到了本地吴姓士族的歧视与排挤，由于王导及侨姓士族的斡旋及北方流民不断南下，聚集在新兴政权周围，“重振”司马氏的威严，司马睿才逐渐得到吴姓士族的支持。正是流民集团的支持，司马睿和侨姓士族组成的统治集团才得以安定南方，最终重建司马氏的统治。对于这一点，已有大量前辈进行过研究，在此不再多说。

此外，身为流民将领的郗鉴在东晋初期的政治格局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相传为汉御史大夫虑的玄孙，然而“少孤贫，博览经籍，躬耕陇亩”，说明他家势已非显贵，只可勉强算为次等士族。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其所在州县之人“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14]](#footnote-14)，成为事实上的流民核心。永昌初年，在其携带乡党南下后，作为一名流民将领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在王敦、苏峻之乱中，郗鉴得到了朝廷倚重，由广陵移镇京口，在此日益壮大。此时，庾亮出走建康，镇芜湖，与身在朝中的王导水火不相容，想起兵诛杀王导，在郗鉴坚决反对下得以停止。东晋一朝，士族当道，皇族没落，往往几个强大士族共同执政，维持着各个士族的利益平衡。但在士族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时，各自还存着许多的私人利益，当某一个士族力量过于强大之时，便会危害到整个士族统治集团的利益，郗鉴当然深谙此道，所以他助东晋平王敦、苏峻，联合王导对抗陶侃、庾亮，得利的不只是他郗鉴自己，更是东晋司马氏政权。苏峻之乱平后，江左地区一个多甲子无内乱，郗鉴功不可没。正如王夫之所说“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15]](#footnote-15).

事实上，正是以郗鉴为首的一批流民集团的鼎力支持，东晋初年爆发的一系列动乱才得以平息，使司马氏在江左的统治得以巩固。同样，东晋内部士族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流民集团同样功不可没。但，流民阶层毕竟属于社会的底层，在社会等级森严、士庶分明的晋朝，流民集团乃至其统帅都备受统治阶层的歧视，在战乱过后，流民集团便陷于沉寂当中，这是历史的必然。活跃于两晋之际的流民阶层，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当时时局变迁不可忽视的因素。

1. 《晋书》卷109《慕容皝传》 [↑](#footnote-ref-1)
2. 《徙戎论》江统 [↑](#footnote-ref-2)
3. 《宋书》卷35《州郡一》 [↑](#footnote-ref-3)
4. 《晋书》卷65《王导传》 [↑](#footnote-ref-4)
5. 《政论》崔实 [↑](#footnote-ref-5)
6. 《晋书》卷100《杜弢传》 [↑](#footnote-ref-6)
7. 《晋书》卷100《苏峻传》 [↑](#footnote-ref-7)
8. 《资治通鉴》卷85《晋纪七》 [↑](#footnote-ref-8)
9. 《晋书》卷51《束皙传》 [↑](#footnote-ref-9)
10. 《晋书》卷100《王如传》 [↑](#footnote-ref-10)
11. 《晋书》卷66《刘弘传》 [↑](#footnote-ref-11)
12. 《晋书》卷109《慕容皝传》 [↑](#footnote-ref-12)
13.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 [↑](#footnote-ref-13)
14. 《晋书》卷67《郗鉴传》 [↑](#footnote-ref-14)
15. 《读通鉴论》卷13 [↑](#footnote-ref-15)